

Vince 17

禁忌

A Line Between Friends

我想，我是他的祕密，
另一個進駐在他心中情感路途上的女人。
不過我並不在意。

界線

Michele VanOrt Cozzens • 著
繆靜芬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A Line Between Friends

禁忌界線

Michele VanOrt Cozzens • 著
繆靜芬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17

禁忌界線

A Line Between Friends

作者◆蜜雪兒·凡奧·柯倫茲 (Michele VanOrt Cozzens)

譯者◆繆靜芬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A LINE BETWEEN FRIENDS by MICHELE, VANORT COZZENS

Copyright © 2006 by COZZE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CKENNA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9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320 元



ISBN 978-957-05-2389-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沒有愛、沒有友誼

可以在永遠不留下痕跡的情況下跨越命運的道路。

法蘭索·莫里亞（Francois Muriac）

柏拉圖式的愛情

是傻瓜替殘障和冷若冰霜之間的情愛所取的名字。

安布魯斯·畢爾斯（Ambrose Bierce）

獻給馬克

諾艾兒 現在

爹地總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戰說成「那場戰爭」，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那場大戰」，也不是「那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就只是說成「那場戰爭」——彷彿重要的戰爭就只有那麼一場。每天晚餐時，爹地訴說著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從在驚濤駭浪中橫越大西洋，到媽咪如何不想跟他約會，因為他不會跳狐步舞，然後他的同船袍澤（可能稱「戰友」更為恰當）教他跳舞，而且因為這些人，他才贏得媽咪——艾蜜莉·佛妮爾——的芳心。他們在一九四二年結婚，爹地穿著正式的海軍軍裝，媽咪則是一襲華麗的絲緞禮服。

爹地的戰爭故事轉變成葛倫·米勒的韻律和槍砲聲的節奏，這些是我最記得爹地的部分。一九六〇年，厄運降臨，爹地的整個臉緊繃，而我也聽不到這些故事了。在我出生後不久，這個世界就已經不再符合爹地的期望。每當他抱怨能力不足的勞工和不道德的鄰居，那語氣就像陳年老橄欖一樣，愈來愈酸澀刻薄。

爹地的戰爭歲月是他最光輝的日子，是他一生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一路走下坡。

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戰部分贏得勝利，那之後，高大、英俊、一頭黃棕色頭髮且剛剛

1 Glen Miller，爵士樂大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帶領美國空軍樂隊在歐洲巡迴演出。

飽經世故的厄爾·蒙卡達從北大西洋返家，回到了伊利諾州那座發臭的小鎮阿果（Argo），也就是芝加哥郊區的玉米粉主要產地。跟在厄爾身旁的是他的新娘，這位精明幹練的美女努力保持著臉上的表情，才不致於流露出心中對這座勞工城那股酸臭燃燒味的厭惡。在船上受過電子學和架線訓練的厄爾，接受了別人提供給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也認為這份工作最好）。他成了電話維修人員，薪資不錯，退休金計畫尚可。就像得到第一份真正工作的人一樣——尤其在經濟大蕭條之後長大的更是如此——他覺得自己很幸運。他身旁有位優雅的紅髮妻子，口袋裡還有張薪水支票。

起初，他們和厄爾的父母親同住，不過處得並不好。一來，艾蜜莉的婆婆不跟她說話。厄爾認為，艾蜜莉無懈可擊的文法和東岸口音嚇壞了他母親；然而一年後，情況並沒有好轉。厄爾花了一萬六千美元買下他們的第一個家，把這個家當作結婚週年禮物送給年輕的妻子。那是一棟白色的「鱈魚岬角式」²建築，有尖樁圍籬和壁爐，地點不錯，位於上風區，遠離阿果鎮頭號工業那股貫穿肌膚的惡臭二十五哩。

我唯一的姊姊珍妮出生於艾森豪時代的嬰兒潮，我則出生在甘迺迪執政時期，這段期間，爹地像馬術冠軍一樣攀爬著電話線桿，像工匠一樣纏繞著電話線。公司給了他一輛生鏽的一九五八年老爺車，我們好愛它，叫它「古古車」。姊姊和我從來不准搭乘那輛車，只有那輛車停在我們家那條柏油車道時，我倆才能夠坐在車裡。有時候，珍妮偷來車鑰匙，我們聆聽著音樂廣播網89-

2 Cape Cod，發源於新英格蘭地區的建築風格，房屋高度低矮、佔地廣闊，一般只有一樓或一樓半的高度，傾斜的屋頂配上山形牆，中央有個大煙囪。

WLS 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芝——加——哥！」我們和電臺中的歌手齊聲吶喊著同一個口號。

每天下午，爹地帶著一張飽經風霜的臉孔回家。他很少看珍妮和我，但是卻親吻媽咪兩次，一邊臉頰親一次，然後走進他的地下室。在地下室裡，他掛好自己的工作服，替自己倒一、兩小杯的傑克丹尼爾威士忌，然後喝掉半打的金獅啤酒，同時吹著口哨，和著沙沙作響、每分鐘七十八轉的唱片。我們在他頭頂上的那一層樓努力做功課，有時候會聽見打拳擊沙包的節奏聲砰砰響。等他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餐時，「那場戰爭」的故事就開始了，接著我們要等他吃完最後一口飯才可以離開餐桌。

厄爾·蒙卡達並沒有活著見到尼克森執政。他去世的時候，正在看黑白電視報導越南戰爭的新聞。當時他心臟病發，地點就在我們家的客廳中間。

他去世那天，我八歲，是個安靜的紅髮小女孩，總是站在姊姊令人生畏且完美無缺的影子裡。我記得我抓住她的手，兩人看著父親膨脹而無生命的身體躺在擔架上被人抬出去。他從我的眼前飄走了，宛若微風吹拂的日子裡一片脹大的雲朵。前門關了起來，仍舊握著珍妮的手的我轉過頭去，看著擺在客廳角落的那臺黑白電視機，剛好那夜的死亡統計資料閃現在螢光幕上。「這次行動中有五百四十三人喪生，」新聞播報員的聲音嚴肅：「目前為止，本週在越南喪生的人數最多。」

「是啊！死亡人數可以再增加一個啊！」珍妮邊喊邊推開我的手，整個人突然崩潰，猛烈地啜泣著，身子不停抽搐。

幾天後，爹地的戰友充當抬棺人。他們在棺木外頭包覆了一面美國國旗，最後一次向爹地行禮致敬。對爹地而言，結束所有戰爭的那場戰爭並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越南戰爭。

爹地把我留給媽咪和姊姊兩個既強勢又善於控制的女人扶養，那感覺就像被擠壓在兩座石製書夾之間。我迫不及待地從高中畢業，上大學去。回顧以往，我幾乎不記得爹地去世後和離家上大學前在家的那段日子。我忙著期待自己的未來，期待到時能夠突破現狀，獲得自由，體驗嘗試各種可能的甜蜜。記憶像只有精彩畫面的電影膠片，在我心中快速往前轉：那天，媽咪第一次讓我熬夜看深夜的電視節目，演的是脫衣舞孀李玫瑰的故事；那天，我當上了啦啦隊隊員；那天，我在科展中因為建造了DNA分子立體模型而贏得傑出獎；還有那天，我偷了珍妮的剃刀，剃掉了自己討厭的長腿毛，然後對媽咪說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終於拿掉牙套的那天，第一次有男生轉過頭來看我。

不過，我記得最清楚的卻是離家那天。

我也和我父親一樣，相信離家後的前幾年會是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而且堅信大學結交的朋友將會終生陪伴我，可能替我提首飾盒，然後在我去世的時候替我寫生動的悼詞。

大一那年認識的兩位朋友克麗奧·金和露比·帕帕斯都是同一個時期的室友。至今，她們還是那種不管我去了哪裡、不管相隔多少時間，都可以隨時聯絡的朋友。雖然我現在住在威斯康辛，克麗奧住在科羅拉多，而露比住在羅德島，但是住在哪裡並不重要。如果有事令我不安，需要把話講出來，我只要打電話給露比，她一定會和我說些「大聲唱出來吧！露意絲！」之類的話，提醒我脫衣舞孀李玫瑰的故事也是她最喜愛的故事之一。而不管是什麼問題，我都可以倚賴克麗奧，她總是給我誠實且直言不諱的意見。

我們之所以維持著儘管相隔遙遠卻如此堅定的友誼，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一直努力維繫。那樣的友誼不僅止於年節問候卡片和記得對方的生日，她們是那種無論發生好事或壞事我都想聯絡的人，她們以一種連我母親和姊姊都無法達到的方式證實了我的經歷。

第一次離家時，我體驗到的經歷和我結交的所有朋友都一樣。

我最愛的大學男性好友叫做約爾·羅蘭。他長得，白膚金髮，整張臉孔很好看，淺藍色的眼睛很像我父親。約爾和我在高中時代有過短暫的接觸，不過直到大一那年，我們發現兩人都修了同一門課才變成朋友。這門課成了跳板，我們因此發展出一段我以為會永遠維繫下去的友誼。

但事實不然。

就像爹地意外倒下死去一樣，約爾突然轉身離開，出奇不意地扼殺了我們的友誼。他寫了一封信結束我們的友誼。

親愛的諾艾兒，

我認為妳跟我保持聯繫是不公平的。對我不公平，對我的妻子艾妮妲也不公平。請不要再寫信或打電話給我。

約爾

我心中的悼詞不是這樣寫的。

約爾 現在

諾艾兒的臉從早報上看著我。上次她寄聖誕卡來以後，我就沒有再看過她的照片了。已經五年了吧？還是十年？我也搞不清楚。我扔掉了她寄來的最後那張聖誕卡，請她不要再跟我聯絡，那之後，她尊重我的要求，沒有再打生日賀電，沒有再寄年節賀卡。她按照我的要求執行，而我不想她了。

至少，我這樣告訴自己，在我第四次看那張報紙廣告的時候：

諾艾兒·蒙卡達·安德森最新小說《大學戀愛故事》簽名會。週三晚間七時至九時在曼海姆路上的「書齋」。

諾艾兒知道我熟悉那間書店，那間書店在我舊家附近，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住在那裡。不過當時，那是一家古怪的商店，叫做「財寶收藏」，特色商品包括薰香和巨型羽毛、黑光燈和珠狀窗簾，都是一九七〇年代的典型裝飾。

我注視著她的照片。報紙的黑白顆粒遮掩掉她淡淡的雀斑，但是蓋不掉因為微笑而新出現的少許紋路，以及閃亮的眼睛邊緣長出的纖細魚尾紋。她是快樂活到老的那種人，我早就知道她會這樣。我想知道，她會對我說同樣的話嗎？

我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看著自己模糊的影像映在廚房水槽上方的窗戶裡。艾妮姐和兒子們還睡在樓上的房間內。整間屋子寧靜、漆黑。不久後，我發動汽車的聲音就會變成喚醒他們的鬧鐘。在我前往火車站的途中，樓上的房間會突然衝開來，像被拔出來的香檳瓶塞一樣。我們的兒子會生氣蓬勃地穿過每個走廊，拿背包和午餐、水瓶和放學後需要的用具，準備面對眼前快樂的一天。艾妮姐把這情況叫做「有系統的混亂」。我的妻子令我訝異的是：她有辦法依照時間表讓所有事情按部就班進行，讓每一個人準時出門。

我拿起咖啡杯，注意到報紙上諾艾兒臉旁的那只耳環。咖啡微溫，苦苦的。我重新加滿杯中的咖啡，先吹一吹，再喝一小口，然後把咖啡杯放回去，放在諾艾兒照片的上方。蒸氣旋轉著，從起泡沫的咖啡中升起，散發出一股撩人的香氣，親切而熟悉，彷彿看見諾艾兒的照片。那就像烤餅乾的味道，吸引著我，嘲笑我心中有份兩面的承諾，包括甜蜜的幻想和內疚的現實。

諾艾兒跟我還沒有結束。

我不必看見她在報紙上的照片就了解這點。我有好多話想告訴她，我想讓她知道，有好多，我都想拿起電話，撥給她，只是要告訴她，我很好，很快樂，我想告訴她為什麼寫那封信請她別再踏入我的生活。有一次，我幾乎這麼做了，真的拿起電話，一張便條紙上潦草地寫著她的電話號碼。那天是九一一事件的第一個週年紀念，當天稍早，我看了電視上的追悼會，追悼會上，孩子們唸出每一位死者的姓名，那些人都是因為遭劫持的飛機撞上紐約世貿大樓而喪生的。我想著那些人，其中有些是我在金融界的同事，那個早晨，他們上班，搭電梯，扔下手中的報紙，啜飲著咖啡。他們回覆了電話留言和電子郵件，對著桌上成堆的工作嘆氣，或者嫉妒隔壁辦

公室裡的新衣服。然後在上午八時四十五分，也許讀完最後一篇報告，才到樓下大廳開會，接著例行公事和瑣事都呈現出全新的意義。

那天我心想，如果我的經紀公司在下曼哈頓區而不是在芝加哥的拉賽爾街，我可能會怎麼做？如果我面對從辦公室的窗戶往外跳或待在辦公桌前的抉擇，我會怎麼做？除了艾妮姐和孩子們，我還會打電話給誰？

我母親去世了，對我來說，父親也等於去世了。我有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威爾，我對他幾乎一無所知。

然後，當然，還有諾艾兒。記憶中她的臉孔、她的笑聲、還有她那如貓咪般閃爍的眼睛，都變得非常清晰。

這麼多年了，我心裡還是留了一個位置給她。

我曾經試著淡化我跟諾艾兒的關係，淡化我倆的友誼。我努力向艾妮姐解釋，我們只是朋友，我說男女即使各自結婚，還是有可能保持友誼。但是艾妮姐堅持要我切斷與諾艾兒的所有聯繫。

寫那封信是我做過最容易也最困難的事。

諾艾兒 一九九五年

現在是威斯康辛州米諾閣的十二月，來到丈夫家鄉的我覺得自己像個移民，像個城市女孩不知不覺地走進森林裡，蟲鳴鳥叫代替了汽車的喇叭聲，四隻腳的動物代替了計程車，穿著單調西裝的男士換成了穿著亮橘色工作服的男子，而且當地的婦女並沒有忽略逛雜貨店的我，反倒是提供一切建議，尤其針對我突然隆起的肚子。

我的名字是諾艾兒·蒙卡達·安德森，原籍伊利諾州的小溪公園，那是一片郊區，有條條街道和停看號誌、兩層樓的住家和大小事都知道的鄰居。那裡的房子彼此貼得好近，近到每次聽到有人打噴嚏，我們就會從自家的廚房窗口向外喊：「老天保佑你」。我在伊利諾州南部讀了四年大學，那是一家離芝加哥郊區極遠的州立學校，大學畢業後，我搬到加州，實踐何瑞斯·葛里利「西進」的想法，同時盡力發揮我那新聞系學位之所長。

我的加州經驗可以總結如下：一份卑微的工作、一份不錯的工作、一段痛苦的婚約。然後我認識了柏克萊大學的法律系學生馬克·安德森，隨後嫁給他。兩年前，我跟隨他從舊金山往東進入森林裡，就像當年我母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父親從紐約搬到芝加哥一樣。

我們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實在可笑。

馬克和我住在離米諾蘭市中心十哩的一間木屋裡。這座「島嶼城市」深陷在到處是松樹、槭樹、白楊、樺樹、人稱「大北林區」(Great Northwoods)的森林間。離我們最近的鄰居相隔幾英畝遠，雖然我知道鄰居姓啥叫啥，不過卻對他們不太了解。有一次，我聽見離我們最近的鄰居在他們的浮筒船上談到我，他們是一對退休夫婦，他們的姓唸起來音節比我的手指頭還多。「你有沒有看見那個高大紅髮的馬克，安德森從加州帶回來什麼東西？她比白楊樹苗還瘦，恐怕熬不過今年冬天喔？」

你會以為當地人明白在水面上聲音很容易傳得很遠，但事實不然。寧靜的早晨，坐在我們家碼頭的末端，雙腳懸掛在起伏的波浪上方，我聽到的是整段對話。大部分是漁夫們說著誰逃脫了之類的謊話；不管怎樣，浮筒船上的聊天不過是蜚語流言。湖畔居民並不喜歡船屋增大，不喜歡湖岸觀測站的外觀變色。無奈上帝幫助新人，讓他們決定在這裡擺進新的筏子，或者更糟的，擺個水上摩托車進來。

他們害怕新出現的人、事、物，那代表改變、開發。在北林區，當地人只喜歡看見樹木和魚群成長。

這裡有兩種季節：寒冷和十分寒冷。雪花在九月開始紛飛，有時候要到五月才停止。待在加州的那十年間，我習慣了任何時候都光著腳踏到屋外拿信件或報紙。現在，我穿著五磅重的Lacrosse牌靴子到處走，保證腳趾頭不會在零下四十度凍傷。

我們搬到這裡是因為新婚的丈夫希望實現他在家鄉建立法律業務的夢想。他向我保證我一